

背叛的历史

—苏联改革秘录

田永祥◎等编译



背叛的历史

背叛的历史

背叛的历史

背叛的历史

——苏联改革秘录

(前苏) 尼古拉·雷日科夫 著
高洪山 韩生民 等译
纪玉祥 校

吉林人民出版社

背 叛 的 历 史
——苏联改革秘录
(前苏) 尼古拉·雷日科夫 著
高洪山 韩生民 等译
纪玉祥 校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梅河口市美术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25印张 插页2 245 000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200册

1 S B N 7 - 206 - 01668 - 5

D · 495

定价：6.50元

译者 高山民 黄维明 唐项登
韩生 马景昆 高鹏
王艳丽 孙青 周通
纪玉祥
校译 纪玉祥

GDA94/42
01

出版者的话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前苏联一些高层领导人纷纷著书立说，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苏共的瓦解、统一联盟国家的崩塌、改革陷入“死胡同”的原因及教训等，进行了追溯和反思。由于他们不仅是前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者，而且是改革过程的决策者、参与者和知情者，因而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所作所为，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和研究上述问题具有第一手材料的意义。特别是，他们的反思性著作对于揭明改革的复杂背景、幕后活动、关键环节、内在联系、隐秘本质、各色人等，具有报刊上一般材料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唯其如此，我们有选择地向读者译介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些著作，以供研究参考。

本书是前苏联政府总理雷日科夫于1992年出版的一部新著，原书题目是：《改革：背叛的历史》。据作者自己讲，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在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工作，从班组长、工段长、车间主任到厂长一级级干起，一干就是25年。在安德罗波夫时期，他调至中央，先后主管过计划、工业、经济体制改革等工作。他、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等人实际上属于“安德罗波夫帮”。雷日科夫认为，苏联的改革不是象后来大肆渲染的那样，通常被说成是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任时才开始的，而是早在安德罗波夫执政时的1983年就已经酝酿和着手了。利加乔夫在其《戈尔巴乔夫之谜》（已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也发表了类似看法。而雷日科夫和戈尔

巴乔夫在当时是安德罗波夫的左膀右臂，积极参与了安德罗波夫首倡的改革。作者认为，1985年所开始的改革不过是始于1983年之改革的继续。

有人说过，每个人都是从特定视角来认知世界的。由于作者有长期实际工作的亲身感受，加之调到中央后对种种“内情”的洞悉，因而他对旧体制的积弊和改革的必要性有特殊的认识和理解。在他看来，旧体制严重窒息了经济、政治和整个社会生活的生机。安德罗波夫所开始的改革是顺乎潮流和人民愿望之举。而在安德罗波夫不久即逝世后，契尔年科时期前此所开始的改革陷入停顿、倒退、混乱。戈尔巴乔夫上任后即倡言改革，在这一点上他同安德罗波夫没有矛盾和分歧。问题在于怎样改，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策略。作者把旧体制同改革的关系比作得病与治病、病人与医生的关系。他说：“治疗应当是彻底的、根本的，但是，这未必适合患严重心肌梗塞的疾病。”就是说，苏联原来就犹如一个罹患心肌梗塞的重病患者，正是被戈尔巴乔夫这个“庸医”采取激进的治疗方法才很快致死的。这里提出了一个带根本性问题，即苏联解体主要原因盖源于旧体制的不可救药，抑或由于戈尔巴乔夫的错误造成的，抑或两种因素兼而有之（当然，两者之中有个主次之分）？现在仍然争论不休，恐怕将长时间争论下去。

书中对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新思维”的前提、前景、改革中的党派纷争与对抗，作者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作者眼中的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和苏共的退却、人代会选举具体经过和苏共的失势、丢权、苏共内部的严重混乱、关于民族仇恨和民族冲突、矿工大罢工、经济体制改革、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各种方案比较与斗争、苏联在经济发展战略上的失误、苏联经济从衰退到危机的系统考察，披露了许多历来鲜为人知的、过

去属于“国家机密”的统计数字和材料，例如前苏联的黄金产量和储备量、军费开支、阿富汗战争费用、进出口情况、重要投资结构，等等。作者说，他是全苏联真正掌握黄金生产和储备情况的三人之一。他为“我们年复一年地将那些该死的原木出口到邻国芬兰，换来的恰恰是用我们的原木加工成的硬纸板和纸张”而感到耻辱和焦虑；苏联曾把大量金钱慷慨捐赠给那些只要说一声“我相信社会主义”的人，即使在1986至1989年的改革年代无偿援外资金达559亿外汇卢布，相当于这期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1.1%，等等。书中对自1986年发生的阿拉木图事件民族冲突愈演愈烈的具体原因和经过、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亚美尼亚大地震也有详尽描述。书中对苏共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问题也多有涉及。作者还不时谈到自己的身世和经历，从中可以看出他们这一代人的世界观和政治个性的形成，也是饶有兴趣的。

本书实际上是从前苏联一个政治领导人的视角上揭示了苏联亡国亡党的某些深层原因和教训，有理有事，既有客观叙述，也有主观感受，文风平实，没有矫饰，读之可以使人联想很多。这对于我们从正反经验的比较中进一步认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的正确性，有一定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

因为原著很多地方带有漫谈性质，兴之所至，枝蔓横生。限于篇幅，略有删节。作者语言习惯又较特殊，往往用典生僻，语句跳跃性大，故有些地方译得不一定准确，加上译者水平有限，舛误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1992年12月

前 言

命运不可测，甚至在一些芥末小事上都不可测，到头来只好相信占星术——这真是最糟糕不过的事情了。

这种悲观的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呢？这一切都是从事件的不可测性得出的，即使个人命运中可觉察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不可预言，但是要知道，个人的命运正是由这些区区小事逐渐积累起来的。与一个大国的命运不同，例如……

目前，我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是很微不足道的。直到如今我不习惯于一个极其平常的思索：我——一个失势的人，前任总理，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记得吗，曾有这样一个党？）。前任的……一日三餐，看看报纸，看看电视，读读书——的确，从此比过去读书多得多，这很有益……在林中散步，夏天、秋天、冬天在林中散步，都很有益，而过去只是呼吸部长会议开会时吸烟者喷出的烟雾……同孙子们交往带来的喜悦，尽管同他们不常见面，因为他们住在莫斯科，我和妻子住在市郊，只是星期日我们才见面，见面的时间异常少……这对你们来说，也是小事，但对我来说，感到是件不寻常的事情。对那些希望我下台的人来说，我已不存在。而对许多人来说，我仍存在于他们之中。每日、每时、甚至有时每分钟电话不断：同事们没有忘记我，朋友们同往常一样征求我的建议，我对每日发生的事件的看法都引起他们的兴趣，并时而把我的建议运用到其工作中，当然，我并非浪漫主义的失宠也使他们谨慎从事。不过，建议是口头表达的思想，而

不是象办公室工作人员习惯用公文形式记录下来的东西。我从来不覬覦对工作建议的著作权，即使我的建议已成为行动的指南。我一向认为，只要行动本身能准确无误，那就好了。现在也是如此……还有拜访：这些同事们时常到我家来，把我那间小小的办公室变成了拥挤和吵闹的“会议室”，这些朋友们来拜访我和妻子。我不故作谦虚地建议：还需要那些需要的人，请原谅我无意识的重复。如果是不需要的人，对我来说也是多余的人。说实话，按照习惯，我总想避开新闻记者，我不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对着麦克风全都讲出来，而当今在上层寻找“意见多元论”的新闻记者却不愿同失宠的总理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上帝将审判他们……

我现在谈的那件事是个人亲身体验的许多小事之一。但奇怪的是，这些小事同人人皆知的大事离奇地联系着。也许，这毫不奇怪？大概，人人皆知的大事恰恰同不计其数的局部的和无足轻重的小事无形地联系着？

好啦，不再讲这种不高明的哲学了！我们来举些事实。

1991年8月18日，这个日期从此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在这个夏末不太炎热的星期日来了几位常客：两位昔日的好友，两位作家，我读过他们的作品并十分尊重他们。我再重复一次，象通常那样：坐在凉台上，饮茶或饮含有酒精的饮料，这并不重要。轻松地聊天、回忆、讲故事，自己回忆并自己讲述。我的这些熟人，尽管也是好奇的人，但都是讲究分寸的人：他们不谈纠缠不清的问题，不从我这儿套取“国家机密”。话题主要是关于政界内我的一些老同事的著作。这些书简直塞满了书店的柜台和地铁站旁不计其数的合作社书摊。前任和现任的政治局和政府的成员们，善于辞令的代表们、专横的市长们以及“国家的第一夫人”——所有这些

人都急于向国内外读者宣传自己关于改革从一开始就处于空转状态，而到1991年8月实际上已经停滞的宝贵见解。

“您总是沉默。”一位聊天的人责备我说。

“没什么好说的。记得吗，诺维拉·玛特维耶娃^①说过：‘世界上的一切都被说过了，没被说过的没有了……’，我开玩笑说。”

但是，过分严肃的交谈者不同意这种说法。

“那么，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事情？”

问题提出来了，带有明显的责备之意。1990年12月，我在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发了言，开头是这样说的，请原谅我引证一长段：

“我根本无权沉默，因为我和其他政治局与国家的领导成员一起对国内发生的一切负有重大责任。因此我将十分坦率地发表意见，希望我的意见、评价，对摆脱目前局面的设想，能在某种程度上有所裨益。”

首先我要说，改革未能按照所设想的样子（我要强调这一点）实现。我是改革的倡导者之一，我认为自己必须对此承担责任。

如果政府危机、内阁更迭能改变局势，政府本来在今年5月就可下台。但情况要严重得多。向政府发动‘不宣而战的战争’的那些政治势力有着更深远的目标。这些目标直接出于要偷换我们已开始的改革的实质。

就象这场战争今年5月份的目标并不在于抛弃政府一样，今天它的目标也不在于向总统、最高苏维埃和人代会宣

^① 俄罗斯女诗人。主要作品有《小船》（1963）、《万物精华》（1966）、《燕子学校》（1973）等抒情诗集和歌谣集。

战。它的主要目的是打击国家，打击社会政治制度，彻底摧毁它。

不仅是整个苏联，而且许多共和国都正在成为这牌局中的一张牌，因为它们的国家机构和社会制度也在受到最严重的威胁。

在这种局面下，我不能仅限于指出改革过程中断的事实。必须在这里对这种中断的整个原因，而不是局部的、零散的情况作出无情的分析。”

我不再继续引用，这已经够长的了。发言于1990年12月20日刊登在许多报纸上。希望读这篇发言的人只要不怕麻烦到附近图书馆都可以找得到的。我以及中肯地批评我不愿写回忆录的那些相识的人们认为，重要的只是痛苦地确认事实：改革没有成功。当时，在12月，改革在濒临死亡地垂死挣扎，要使它死亡或把它彻底搞垮，已不需要做很多事情（谁需要？为什么？）。改革已成为历史，如果社会学家能在当今社会中继续存在的话，那么改革就将成为未来社会学家论文的题目。

也好，在代表大会上我说了当时想说的话和最痛心的问题。尽管发言很短，讲得很快（由于发言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是我讲了，就好似一石激起千层浪，甚至直来直往，开门见山。结果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那些“不宣而战”的人们都一遍又一遍地和大声疾呼地向总统和最高苏维埃提出了要求。在那些日子里，总理成了他们最直接的攻击对象。但一般来说，尚未腾出手来攻击总统本人、最高苏维埃和代表。或许是时候未到……好啦，还有什么需要回忆的呢？还要写什么呢？谁还对早自1983年安德罗波夫执政起（绝不是官方通常所说的自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起）开始的就算是伟大革命过程的奥妙莫测的详细情况感兴趣呢？没有人感兴趣，我

仍然带着痛苦的怀疑心情这样认为，并自然地拒绝了我们的和不属于我们的出版社所提出的令人高兴的建议，它们不时地促使我“写作”。

……已经傍晚了，天色已黑，我送客人们出院门。

“谁是您的邻居？”一位客人问道，用头指向那高大的新筑起的绿色围墙。

“副总统。”我以外交辞令的语气回答。这算是对我这个过时人物的信任！如此高贵的邻居……

“微不足道的人。”一位客人反应道，“我早在共青团组织中时就知道他。”

“总统更显赫些。”我富有外交辞令地说。“万一他还能表现自己呢？”

说到这儿我们就道别了。客人们走了，而我一个人孤独地留下来，仍犹豫不决，写还是不写……我引用了女诗人的诗句，但我要了个滑头，没有全部说出引文：“……然而，尚未说出的道理的光芒永远照耀着人们”。一件小事，善意的客人们的来访又一次唤起我的心，使我彻夜不眠。这件事就说明了上面的道理。的确，在过去发疯的年代，我心头积存了多少要说的话！我是如何习惯于沉默！

星期一大早，7点钟打开电视机后，我得知我的邻居真地“表现了自己”……

我不打算写政变和政变分子。顺便说说，他们中的某些人我很了解。我对政变细节的了解程度和消息的来源，同我的所有读者没有什么不同：电视、广播、报纸。我认为政变成了标志我国改革寿终正寝的界石。改革陷于濒死状态了吗？是的，它曾进行垂死挣扎。而现在，改革不可避免地死亡了。不论是侥幸还是倒霉，这迟早会受到历史的审判。历史就好

比一个女子学校的女学监，尽管她慢慢腾腾，但她是非常公正的，她对姐妹们总是一视同仁。

尽管政变使改革终结，但它促使我坐到写字台前开始写作，不再犹豫。应当把尚未谈及的有关改革历史的一切情况都写出来。改革的历史对国家来说是短暂的，但对我个人的政治生涯来说却是漫长的。不仅对我，而且对整个国家来说，改革已成为大大小小背叛行为的历史。

什么背叛行为？

背叛谁？

何时背叛？

谁背叛？

这些正是我要谈的问题，以便审判时刻到来时，让历史来考虑我的见证。要知道，我只是道出了毫不留情地分析这个寿命不长和一命呜呼的“改革帝国”（请原谅我的多余的慷慨激情！）兴衰原因的必要性，但是我并没有进行分析。依我看，当前还没有人这样做。这就使我认识到，保持沉默是错误的。不是对国家有过错，而是对生活在这个逻辑颠倒的世界上的自己的子孙们有过错。尽管如此，但是他们仍会成长。将来，当历史要开口说话时，他们会问我（如果我能活到那时，我希望能活到那时）：爷爷，干么你当时沉默？

到那时我将如何回答他们呢？他们不象我现在的作家朋友们，用玩笑来敷衍他们是不行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下决心开始我的伟大行动（对我来说，这部著作是多么伟大的行动呀！），坐到写字台前，把一叠干净的稿纸移到身边，提起了钢笔并亲自祈祷说：“上帝保佑！”

目 录

一、令人窒息的气氛	(1)
二、开端	(21)
三、动乱时期	(46)
四、“于是有个人起了名字.....”	(63)
五、对抗	(84)
六、关于党的退却.....	(102)
七、切尔诺贝利的考验.....	(113)
八、在行进中.....	(133)
九、祸不单行.....	(152)
十、关于民族仇视的题外话.....	(173)
十一、原因与结果.....	(201)
十二、生意人不打生意人.....	(220)
十三、“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238)
十四、什么道路能通向市场？——到达 十字路口前的历程.....	(258)
十五、什么道路能通向市场？——过了 十字路口后的不同途径.....	(280)
十六、闲话权力.....	(304)
十七、背叛的历史.....	(319)
十八、结束语——论爱.....	(324)

一、令人窒息的气氛

但是，首先应当继续生存下去。

要从因患心肌梗塞症而空虚无聊的情绪中摆脱出来，继续生存下去，尽管开始感到自己好象耶稣被钉在病床上（请原谅我咒骂起上帝来了）：右手上打吊针输液，左手上也绑有什么“令人喜爱的”东西，头不能离开枕头。就象后来总统在自由的福罗斯与世隔绝一样：电话、收音机、电视机——一切都哑巴了，只有医生、护士似乎在支持秘密的缄默抵制，机械地硬性规定：您不许激动，您应该完全安静下来。

几个月之后，当我参加俄罗斯总统短暂的竞选活动时，在最民主的和意见最多元化的几种报纸上出现了如下猎奇性的报道：雷日科夫有心肌梗塞病吗？如果有的话，他如何能在电视中频繁出现，每天发表演说，视察全国呢？甚至列举了心肌梗塞病专家的来信，其中怒气冲冲地断言：说我3年前受心肌梗塞病的折磨，到如今仍感不舒服，而这次……然而只是出于新闻记者仅有的一点礼貌（它被公开性时代破坏了），没给贴上雷日科夫滥竽充数的标签……

对不起，是我的过错，因为我活下来了，恢复了健康，竭力忘掉了疾病！请原谅，善良的人们！……为什么结果是这样呢？这很简单，大概应当问医生。当然，我可以向你们介绍一下我的疾病史、心电图、化验结果，但恐怕至少不是每

个人都感兴趣。因为我一生任何严重疾病都没患过，也许只患过感冒，所以对心肌梗塞这种该死的疾病并未信以为真，尽管最初感觉不好，异乎寻常地不好。但是，医生肯定地许诺说：一个月后您自己将从医院走出去。我相信了，我总是信任医生。的确，一个月后我自己出院了……。如果真正说来，恰是在规模庞大而美丽的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的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不寻常的工作经历，造就了我始终健康的体魄。我相信是这样。从来没有时间得病，也未学会得病。这是我同那些喜欢这种“营生”并在自己的报纸上谈论自己的这种喜好的人的区别。

但是，我要再重复一下，在头几天我有点害怕，这恰恰可能是因为我从来不知道疼痛和不能活动的滋味。正因为如此，我无条件地听从了医生的话，相信了他们，没有任何反抗地同意了他们的缄默之计，甚至对妻子也缄默——在我被拘禁的头几天，她冲到我的病房，尽管最初只呆10分钟，但还是闯进来啦——什么重要事情都没告诉她。12月26日夜我住进医院，过了两个星期，已是1991年1月10日，主治医生来到病房，好象试探，小心地问道：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打来电话，问什么时候他能看望您？”

问题的提出使人感到好奇！记得从前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从不提前打这样的招呼……

“这里的主人不是我”，我如此小心地恭维地说。“是否可以和何时可以，您决定吧……”

而我自己默默地想：越快越好。我的确这样认为：对他也好，对我也好，将要进行的谈话是非常不愉快的，但又是必须进行的。

然而情况似乎不象我想的那样。戈尔巴乔夫是在星期六，1月12日下午快5点钟的时候到我这儿来的（啊，我忘记说了，我已经独立地在病房内走动了，尽管依然禁止我利用同外部联系的一切手段来与妻子取得联系，妻子这时已被允许每天陪我一个小时）。戈尔巴乔夫总的来说是个多愁善感的人，那天晚上也没有遮掩自己的多愁善感，他看见我后，受感动了，甚至表情显得很悲伤。没有什么可惊讶的，因为当我每天早晨刮胡子时，都从镜子里看到多少有些可怕（说是轻些）、消瘦的绿色的面孔……。戈尔巴乔夫是直接从克里姆林宫来医院的，看来是从联邦委员会会场来的，显得筋疲力尽。新的一年已经开始，而眼看着衰落和瓦解的国家对新的一年尚未准备（不过，谈论这个已经晚了）。他无精打采地说：“甚至连午饭都没来得及吃。在你这儿吃点东西，有什么可吃的吗？”

端来了茶、夹肉肠的面包片——这只是稍微吃点东西，医院严格的午饭时间早已过去。

对我的健康情况进行了例行的询问之后，戈尔巴乔夫开始谈事情，我认为，他今天想见我就是为了这件事。的确，几个月过去了，现在我试图分析一下整个局势，我知道他的性格，但这次他想认真地谈谈吗？莫非这次短促的“教堂会晤”对他来说只是出于对濒临死亡的老战友的尊重，出于葬礼前的礼貌？很难说……

就实质而言，葬礼已经举行过了。我指的是苏联部长会议的葬礼，指的是出现了一个新的、任何人都不明白和至今任何人都未对其进行解释（能全部解释清楚吗？）的机构。这个机构被命名为“内阁”，直接隶属于总统管辖。现在，这个刚刚组成的机构同样悄悄地死亡了（或者准确地说，并非那